

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走进千家万户

北京、浙江、福建、新疆面向基层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为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北京、浙江、福建、新疆等地面向基层，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北京：党员干部、高校师生、基层百姓齐宣讲

北京市领导带头到所联系的区和分管领域宣讲，结合下基层调研抓好宣传贯彻。同时，北京市精心组织党员领导干部、高校师生和基层百姓，深入社区、机关、校园、“两新”组织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积极开展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宣讲活动。

25位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党员领导干部组成的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深入各区、各系统开展28场集中宣讲。宣讲团成员还深入街道社区、田间地头和基层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宣讲。

北京市充分发挥首都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18家高校遴选优秀师资组成宣讲队伍，深入基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讲活动。

此外，北京市还将理论宣讲与百姓宣讲有机结合，从“工匠精神”“不忘初心跟党走”“我与改革开放”等百姓宣讲团中挑选优秀宣讲员，聚焦制度自信，用群众视角、身边故事、百姓语言深入基层开展宣讲。

浙江：打通基层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27日下午，“织里·知礼”宣讲团走进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据新华社石家庄11月28日电（记者王民、冯维健）前不久，在河北省阜城县古城镇北徐村发生了一起无证砍伐速生杨事件。接到群众举报后，古城镇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局局长安景岗立刻派人赶赴现场调查取证，经确认，现场共有53棵速生杨被砍，执法人员随即对采伐人员进行了处罚及批评教育。

“过去，无证砍伐归县林业部门和派出所所管，一个部门单独执法力度有限，两个部门联合执法协调困难。分头管吧，管不全；都管吧，最后又成了都不管。”安景岗说，现在由一支熟悉地形、了解乡情的专业执法队伍集中综合执法，力度和效率都提高了。

作为河北省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唯一的试点县，阜城县古城镇成立乡镇一级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局，将县直部门的部分执法权力下放，在全国率先赋予乡镇行政执法权，让执法力量直达基层、更接“地气”。

2016年6月，古城镇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启动，首要任务就是将县直部门的执法权下放到乡镇。经过调研，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586项发生频率高且存在多头重复交叉执法的事项被列入改革重点。今年又有31项执法事项下放到乡镇，目前，下放事项已占全部执法事项的30%，涉及住建、环保、国土、农林等11个部门。

古城镇党委书记文勇介绍，考虑到乡镇工作实际，下放的执法事项大多容易操作。查处假冒伪劣农资、药品、食品等专业性较强的执法事项没有下放。此外，古城镇还根据下放执法事项编制了《权力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确保清单以外无权力，避免权责不明、越权执法、模糊执法等情况出现。

为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古城镇为28名执法人员配备了无人机、执法记录仪、对讲机和执法车辆。执法人员全部上墙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全镇分为4个执法片区，每个片区由1个执法中队、4名执法人员分包，实行网格化管理。向社会公布热线电话，随时接受举报投诉。

“原来乡镇一级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之后，上面的千条线到了乡镇拧成了一股绳。”文勇说，目前，古城镇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局已办理各类行政执法案件285件，安全生产事故大幅下降，违法问题明显减少，群众投诉举报得到较好解决。

区织里镇伍浦村，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让村民们充分了解全会的主题内容和核心思想。

“织里·知礼”宣讲团结合实际镇情，面对面答疑解惑、重点讲解，实实在在地排忧解难，真正打通基层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四中全会精神好，贯彻落实要抓牢，社会治理靠大家，平安和谐人人好。”为了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76岁的老党员孙杏松最近很忙，他用朴实的乡音将四中全会精神唱了出来。

在群众文化工作中辛勤耕耘40余年的孙杏松，以杨柳青调、紫竹调、三句半、快板等多种曲艺形式创作宣讲作品80多篇，牵头组建了雷甸镇“红乡贤说唱团”。

雷甸镇塘北村党委书记马琪荣说，说唱团深入到村社、企业、学校、文化礼堂，义务开展巡演，弘扬文明乡风，传递红色能量，用乡音唱响党音。

福建：增强干部群众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8日至22日，福建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13名成员先后在福建各地及省属高校、企业和群团系统，举办宣讲报告会14场，互动交流活动15场，直接听众达12000余人。

福建省省委宣讲团坚持把制度自信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展开宣讲。

福建省省委讲师团理论教育处处长魏胜良告诉记者，宣讲力求“吃透精神，结合实际，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入脑入心”，

心，突出实效”，将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与福建省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增强干部群众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注重联系实际精准回应群众关切、充分应用新传播方法与平台……宣讲活动在福建省内引发热烈反响。“听完宣讲，我对‘四个自信’尤其是制度自信有了更深的理解。”共青团南平市委副书记张田怡说。

新疆：推动全会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组织开展“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送基层”活动，宣讲团赴各乡镇开展宣讲，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走进千家万户。

在拜城县康其乡，宣讲团成员紧扣全会主题，突出重点，用浅显的语言讲理论、讲变化。“听了宣讲后，我收获了很多。全会提出要增进人民福祉，当前，党的惠民政策惠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康其乡康其村村民玉素甫·亚合甫说。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花儿”代表性传承人，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王秀芳参加了市区两级组织的宣讲员培训，通过“花儿”演唱的形式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王秀芳说：“这种方式老百姓比较容易理解、比较接地气。这几年新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生活都非常幸福。今后，我要把群众获得的幸福生活，用‘花儿’这种方式传递出去，把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到老百姓心中。”

（记者王君璐、岳德亮、秦宏、于涛）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为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不懈努力

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罗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其中强调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的内涵是什么？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人民法院肩负着哪些任务？记者近日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

追求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实质法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江必新表示，全会闭幕后，最高人民法院迅速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公平正义，民之所向。江必新说，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标志着我们党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内涵和规律有了更加深刻、更高水平的认识。

“法治的基本内涵，就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江必新说，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生存、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的基本要求，更是我们党自诞生以来不断为之努力奋斗的初心和使命。

江必新说，强调用法治的力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说明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单纯以权利或者义务为本位的法治，而是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本位和目标的“实质法治”。

“我们强调的公平正义，是一种事实上的公正、全社会的公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正。这种公平正义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也融汇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人民群众的质朴正义观。”江必新说。

“过去，司法机关更多强调的是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严格依法办案，更要在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通过更高水平的工作推动更高层次的法治建设，在执法办案中传播正能量、引领社会风尚。”他说。

用法治力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实现

公平正义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法治是公平正义的坚实保障。江必新表示，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得到国家公权力的支持、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同时，法律的制定过程也是社会共识形成的过程，意味着社会对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公平正义达成了最大公约数。

“从立法、执法到司法，法治的每一个过程，实际上是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配置，也就是公平正义实现的过程。”江必新说，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不仅将使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充分实现，更能让全面依法治国得到全体社会成员更加衷心的拥护，确保法治建设行稳致远。

如何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江必新说，对于司法机关来说，要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标杆，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和最大化。

“一方面要防止机械理解和适用法律，避免作出与社会普遍认识和人民群众正义情感相悖的判决；另一方面也要坚守法律底线，严格树立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法律底线不可逾越的法治权威。”江必新说，“法律往往具有滞后性，而法治本身应当是开放性的。对于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的法律空白、法意模糊以及法律冲突等问题，应当允许司法人员通过寻找、明晰法律等方式来弥补法律本身的不足，在作出公正裁判的同时助推法律完善，从而使社会各方的权利义务得到优化配置，推动公平正义得到更好实现。”

江必新同时表示，司法机关必须坚决防止“打招呼”“批条子”等干预司法案件的现象，处理好依法办案和忠实履职的关系，坚决排除各种干预和潜规则，杜绝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防止司法人员被利益集团俘获，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不被践踏和扭曲。

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标杆提升人民法院工作

“推动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对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江必新说，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围绕大局履职尽责，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江必新表示，人民法院将坚持把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作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以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积极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深度应用，努力把智慧法院建设提升到新水平。”他说，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强弱项、补短板，加快司法领域制度建设步伐，促进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江必新同时表示，人民法院将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着力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完善人民权益司法保障制度，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完善司法便民利民措施，积极服务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两个一站式”建设，有效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积极参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促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司法审判不仅仅要以法律为基本遵循，还要以社会所公认的公平正义观念作为重要参照，这样才能追求实质正义，在适用规则时充分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既保证个案公正，又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江必新说。

百名专家谈中国制度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李延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

“中央银行体系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一个好的中央银行体系的运行，可以为整个金融领域的治理奠定良好基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此次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规范管理、提高宏观调控效果乃至国家治理都有重要意义。

他表示，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以来，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不断完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提升到新高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完善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框架，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任务。”曾刚说。

他认为，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础。

“经济发展需要货币供给的相应增长，而基础货币是整个信用的基础。”

曾刚表示，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2004年至2014年，外汇占款是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而后随着外汇流入的减少，外汇占款呈下降趋势。人民银行开始通过定向降准、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基础货币。

“过去以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中国作为独立大国的中央银行政策容易受到外部影响。而再贷款、流动性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很难构成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曾刚说，各国基础货币供给的差异很大，有的国家以再贷款为主，有的国家是以政府信用国债作为货币供给的主要机制。当下来，我国要探讨长期的基础货币供给机制，既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必须可控、独立，受外部影响较小。

曾刚认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更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个现代的中央银行的调控体系，有赖于市场传导机制的不断完善。”曾刚说，为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市场利率降低的同时，资产端银行的贷款利率较难降下去，这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有很大关系。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畅涉及到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及市场化主体的改革。金融机构改革进一步推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强化预算约束、竞争中性，让其对利率敏感性更高，这些改革将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创造更好的环境。”

他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还需完善政策工具，提高调控效率。过去一段时间，央行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工具，推出多种新型的流动性管理工具，结构性调控的能力提升，更精准地满足实体经济需要。

曾刚认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还要更好地发挥央行对金融稳定的作用，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需要一套新的宏观审慎评估和管理框架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与传统的货币政策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传统货币政策的目的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防范风险，两者长期是统一的，但短期的工具使用是有差异的。”

“总体来说，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宏观调控效果和效率，稳定经济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风险底线，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曾刚说。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提高宏观调控效果

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

百名专家谈中国制度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李延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

“中央银行体系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一个好的中央银行体系的运行，可以为整个金融领域的治理奠定良好基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此次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规范管理、提高宏观调控效果乃至国家治理都有重要意义。

他表示，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以来，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不断完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提升到新高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完善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框架，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任务。”曾刚说。

他认为，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础。

“经济发展需要货币供给的相应增长，而基础货币是整个信用的基础。”

曾刚表示，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2004年至2014年，外汇占款是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而后随着外汇流入的减少，外汇占款呈下降趋势。人民银行开始通过定向降准、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基础货币。

“过去以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中国作为独立大国的中央银行政策容易受到外部影响。而再贷款、流动性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很难构成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曾刚说，各国基础货币供给的差异很大，有的国家以再贷款为主，有的国家是以政府信用国债作为货币供给的主要机制。当下来，我国要探讨长期的基础货币供给机制，既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必须可控、独立，受外部影响较小。

曾刚认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更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个现代的中央银行的调控体系，有赖于市场传导机制的不断完善。”曾刚说，为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市场利率降低的同时，资产端银行的贷款利率较难降下去，这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有很大关系。